

文史资料选编 第三十七辑 目 录

一个外国人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

..... (美) 胡伯特·费瑞恩著 朱启明译 (1)

我的自述 陈此生 (63)

珍珠港事变后回到桂林的日记 陈此生 (71)

何香凝画菊图题跋 马叙伦 茅盾等 (92)

清末民初的军官学校 彭明 (99)

战后对日索赔工作与光华寮案 周锡卿 (115)

国民党空军的建立与发展 赵新 (123)

少年时期的老舍 刘澄清 (130)

《五月的鲜花》曲作者阎述诗二三事 白 仑 (134)

爱国职业教育家费起鹤的一生 费路路 (138)

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家

——缅怀贝满女中管叶羽校长 黄亦平 李爽麟 (150)

- 忆我的老师姜文熙教授.....范日新(168)》
- 存素堂丝绣散记.....朱海北(174)》
- 一息斋记.....朱启铃(178)》
- 傅惜华与碧渠馆藏书.....傅耕野(182)》
- 李烈钧在中山先生逝世前后.....杨仲子(197)》
- 剧坛鸿爪录(四).....翁偶虹(203)》
- 京剧艺术在美国之发展.....徐英(208)》
- 北京早期电影业和一个电影放映世家...侯希三(215)》
- 八国联军进京见闻录.....齐如山 遗稿(230)》
- 旧卫生部组织的变迁.....傅惠 邓宗禹(253)》
- 蜡库旧事.....李梦黑(278)》

一个外国人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

(美) 胡伯特·费瑞恩 著

朱启明 译

编者按：胡伯特·费瑞恩(Hubert Freyn)，1935年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到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国戏剧。是年冬，他在“一二·九”运动巨浪的冲击下，毅然放弃了“局外人”的处境，以一名燕大同学的身份，参加了“一二·一六”、“南下扩大宣传团”、“三·三一”和“六·一三”等活动。1939年，他就这段经历，并参考中外报刊杂志资料，写成了一本11万多字，共分6章的著作，全面记述了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在全国的开展情况。书名为《战争的前奏》(《PRELUDE TO WAR》)，副标题为“1935—1936年中国的学运”(“The Chinese Student Rebellion of 1935—1936”)，并于1940年由上海中国时事发行公司出版。

此书英文原版，迄今所知，留传下来很少了。本书为雷洁琼教授所保存，是作者亲自签名赠给严景耀教授的。在此书残旧的扉页上印有“献给1935—1936年冬春学期我的燕大同学们”。此外，还有作者亲笔书写的：“献给严景耀博士，用以怀念曾在燕京度过的时光。”

此书最近由朱启明同志（他是当年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燕大学生）译成了中文。现将该书的序言和第一、三、四等章节略经删节登载如下。本文大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。

序 言

为了继续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，特别是戏剧（这是我曾经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攻读过的课题），我于1935年9月来到北平。当时，我身居燕京大学，面对一派可以饱览这座古城丰富遗产的，明媚有趣而又魅力无穷的前景，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呈现出好兆头，深信自己即将进入一个充满学术气氛的年头。当然，对于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来的中日关系，我不会毫无感觉，但我并不觉得会发生什么波及我个人生活的事件，总以为不平静、干扰都难免发生，也将是微不足道的。我所在的新环境把我完全迷住了。它使我对政治之类的讨厌题目不屑一顾，连报纸也不耐烦看。就在我沉醉于幸福的无知之中时，政治地平线上却早已经出现了多种险情。

当时，我尽情地享受燕京校园里，以及西山、长城等其他一些初访者必游的名胜古迹的美景。当我逐渐与人结识时，我的同屋，使我能够十分近便地对中国大学生进行细致观察。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没有被当时的实际处境和未来前途如何所干扰。我对什么是大多数同学所忧心忡忡的事情毫无察觉；表面上，一切都那么恬静、和平，作为局外人，我无缘窥见那惬意的

日常学生生活背后真正的底蕴。

我终于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，一下子被“一二·九”运动所抓住了。事前，对眼皮底下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无论我的同屋还是其他人，都从来没有给我过片言只语的暗示。那天清晨，我一觉醒来，就发现我的同屋不知去向了，其他许多学生也都不见了。尽管有的教授曾听到传说，学生们正在计划着有所行动，但大多数教职员们都对此感到突然。

当天，我除了等待游行的人从城里回来外，无所事事，就到图书馆里翻阅华北的旧报纸。从报上窥见的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一些端倪，使我了解了当时的形势和眼前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意识到学生们的行动关系重大。而这，就是我曾书本上读到过的，近代中国时常发生的学生运动！现在，我已身临其境，有可能目睹这一切了！

当一群群游行的人们相继返校的时候，天色已经黑了，大家又乏，又饿，情绪有些沮丧。我的同屋也是如此。这倒把我因自己被蒙在鼓里而激起的一肚子火平息下去了。我的同屋在诅咒了一阵之后，向我讲了他们一天的经历。从这时起，我下定决心，下次一定亲自参加。

我的“田园诗”就此完结了。中国戏剧突然变得兴味索然，无足轻重。在短短的12小时内，平安、恬静、使人忘怀一切的气氛一扫而光。大地面貌依旧，但显得阴沉忧郁，以往战争的阴霾重新出现。人人都在紧张地期待着，灾难似乎正在迫近，人们好像已经听到远处那隆隆的炮声。

从“一二·一六”开始，我再也不是一个局外人了——没有这个转变，这本书就无由写成。

我成了“哥儿们”。其实，基本上是个“老弟”。那些小伙子们时刻把我挂在心上，自认为要对我的安危和健康负责。于是，我就确实成了个比他们年长一倍的“小老弟”，一切行动都听命于他们。在我需要帮助，而他们又力所不及的时候，他们就对我做出同情、热心和毫不含糊的人道主义的表示。

值此关键时刻，我所得到的友谊，是否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？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我的前任系主任去判断。我本人对这次重大转变从不后悔。相反，在这段奇特而又激动人心的日子里，有那么多人一直和我在一起，给我诚挚的友情，我对他们是非常感激的。

他们中的许多人，据我所知，现在已经分布在全国各地，终于能够实践自己的爱国热忱了。为了迎接光明的未来，他们正在战斗。在这里，我对他们谨致最美好的祝愿！

H·费瑞恩

1939年8月9日于上海

美丽而恬静的燕园^①

学年伊始，中国各地许多青年男女为接受高等教育，来到位于古都西北郊的燕京大学。学生中，有半数以上来自靠近广州的亚热带各省；有一些来自长江流域；还有一些家居内地；其余的一小部分就住在这座帝都内，距学校只有半小时的公共汽车路程。各地学生总计840余名，其中830名是本科生，394名一年级新生；按性别分，男生610名，女生274名。

① 此节为原书第一章。

翻开校园报纸，其中不乏激动人心的标题：“本届新生异常活跃，示威反对二年级生搞‘拖尸’”^①、“本学期注册人数破记录，宿舍紧张，令人烦恼”，等等。这座美国人办的中国大学究竟“美国化”到什么程度？在下结论前，先让我们在校园里走一圈。

我们首先来到微风吹拂着的湖畔。这里建有二十四五座美丽的建筑。其外型是中式的，有拱起的大屋顶和精美的雕梁画栋。这是一位美国建筑家设计的，他为了把中、西两种迥然不同的传统建筑风格协调起来，做了这次大规模的“内西外中”的实验。离开湖畔，就进入了风景如画的、开阔的公园，园里有若干坚固、新颖，但又不陌生的平房，旁边是网球场。水塔隐藏在一座中国式的塔里，它后面有个操场；电话和电灯线沿校园的主干路并行。湖边绿柳成荫，只是那支大烟筒在这美景中显得很不协调。

我们多少有些失望：“这不过是一座中式包装的西方大学。”看来，为睹其“庐山真面目”，我们还须做一番努力。跨过一座小溪上的白石桥，我们来到男生宿舍，一共6所。只见门前存放着许多自行车；这里的学生谁也没有汽车。在北平，汽车属于将军、大使和财主们，学生进城，只能乘坐大轿车。

步入宿舍，我们面对的不是豪华的厅堂，而是狭长的、光线不怎么充足的、石铺地面的走道；两旁各有若干排着号码的房间，房门上嵌有写着两个名字的卡片。唯一不嵌卡片的是大门左边的第一个房间。通过敞开的门，只见二名身着黑色仆人装的中年人，坐在桌旁。他们是服务员，一旦什么地方传来一声“斋夫”的喊叫，他们三人之一就得起立应命。这就是住在学生宿舍

① 拖尸，英文toss。是从美国大学传来的一种陋习，由二年级学生对一年级新生搞恶作剧。

里的仆人。

我们进入一个房间，迎面窗户下摆着一张桌子，两位身穿学生装（蓝布大褂）的青年，在桌子的两侧对坐，他们从粗糙的椅子上站起来，鞠躬说道：“请坐。”

为了不干扰他们，我们走进了另一个房间，那里没人。房间里有两张中国式的硬板床，床上有简单的被褥。室内还有木制的立柜和衣橱各一个，两个洗脸盆，若干块钉在墙上的木板（当书架用）和一盏电灯。地是水磨石的。粉白的墙壁由住者根据自己的爱好装饰。没有窗帘、地毯和软椅或其他供人享受的舒适家具。生活是简朴的，但又不是“斯巴达”式的。这种简朴生活不是强制性的，而是由家庭传统带来的。在中国，做父母的无论贫富，都认为对子女不应该娇养，至少在物质生活上是如此。学生们把书籍、纸张和衣物随便乱丢，很少有人想搞整齐。宿舍中这种放荡不羁的现象也表现在一些男生的外表上，他们在校园中漫步，透过他们心灵的窗口，可以看出他们好像只有一条规则——安适。

最近从报端得知，有个美国学生因穿短裤上课，在休斯敦和得克萨斯被某学院开除了。照此标准，燕大的学生怕有25%得走人。这个校园就像一座庭院，人们在夏天只消穿点汗衫之类的东西遮体就行了。上课时，人们也穿短袖衬衫，通常是穿长裤，偶尔也戴一条领带；运动场上，人们穿短裤、运动衫、运动鞋；在饭厅里就更随便了，男生可以只穿两块极为简单的东西，如果天气过于炎热，上面的一块还可以省掉，所有这一切都很自然。因为，这些男生是在“家”里，是和自己人在一起。尽管外人，包括异性并不禁止入内，但异性入内的情况极少出现。很多人穿中式长袍，它能把舒适与色调的变化合为一体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

显得庄重，进城时穿特别适合。进城意味着要装扮起来，中、西式都行。在冬天，本乡本土的大棉袍能和各种皮夹克、西裤以及形形色色的毛衣和围巾相竞争。毫无疑问，中国人是个人主义者。

让我们继续宿舍中的巡礼。在有50名学生居住的每层楼里都有一间浴室，装有4个浴盆，8个喷头。全楼没有可供浏览的厅堂，没有可以供人斜靠一下的地方。

与宿舍相连的饭厅也显得同样简陋。饭厅是一座高大的屋子，里面有几十张方桌，每桌配有4个没有靠背的凳子，桌上没有中国传统的银器皿，只有4双红色木筷子和瓷器汤匙。没有咖啡间。日常正餐每桌是四菜一汤，由仆人送上桌，菜中有肉和蔬菜，馒头、米饭自取，管够。不备饮水用的杯子（尽管在校园中有未经煮沸的水可供饮用），也没有茶。早、午餐一般用一刻钟就能吃完，晚餐稍多费一点时间。学生们吃饭时并不围桌而坐，或边吸烟边谈天，他们常常是口中嚼着最后一口饭菜就奔向寝室、教室、图书馆或实验室了。

他们为什么如此匆匆忙忙，只要看看他们的课程表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上课时间每周从16节到30节，一二年级学生还要上两小时的军训和体育必修课。和美国一样，每节课的课外作业要求是两小时。这样紧张的生活不是出于经济压力。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，这所大学被认为是奢侈的，有点像美国的哈佛，来此就学的人，一般至少是小康之家的子女。尽管如此，那种整天玩个没够的纨绔子弟，在这里却很难找到。我问过一位中国教授，对他的学生作何评论，他说：“他们学习太多，体育锻炼不足。”

学生们在艰苦攻读之余，也有一定的消遣。打网球，踢足球，溜冰，是调济校园生活的主要花样；吸烟、跳舞、放荡的茶

会和酗酒根本没有。娱乐的高峰仅仅是周末进城看一场电影。

中国学生到大学来只是为了读书，传统的治学之道原封未动。

为了说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外表的区别，不妨再举几例。一位一年级新生拿来一篇英文作文请我修改，那是一篇描写教室的文章，其中有这样的语句：“在教室里，我最喜欢的是和气的教师和同学们那些斯文的面孔。”我不想说，所有的中国大学生都会这么写，可是，除了远东外，其他地区的大学生谁会这么写呢？“同学们斯文的面孔”，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提示。当你在校园观察人们千姿百态的面孔时，你可以注意到，在美国大学里难得一见而在这里却是人所共有的一个特征：一副文质彬彬的表情。这是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标记。中国艺术即便在它最现实主义的阶段，也从来不是粗糙的，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本身就是文雅的。这种文质彬彬的气质，是一种经过数千年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民族特征。在美国学生看来，他们似乎缺乏好斗习性。这里的足球运动在美国人看来也过于温和；橄榄球流行不了，因为它被看做是过分野蛮、粗鲁的运动。校际运动竞赛虽然仿效西方，每学期举办一次，但从来不像在美国那样广泛，也不可能让群众中掀起狂热。学生们对这类活动是会有议论的，我从没遇到过一位成人对体育比赛特别关心。中国人太敏感了，看对抗性太强的表演是不会觉得太愉快的。

中国的学生们相当耐寒，室内气温保持在华氏60度（15摄氏度左右），这对西方学生来说是不舒服的。对声和光，他们也显得迟钝，打字机的砰砰声无碍同屋入睡。寝室电灯每晚靠定时拉总闸才能熄灭，而大家却都有本事在亮光下睡觉，谁也不管关灯。

尽管如此，他们到底还是十分敏感的，许多男孩子的整个身体就像是由一捆神经组成的。他们的动作、姿势、眼神、语调（如果不是出于礼貌的原因自我克制的话）时时透露出一种高傲的、感情丰富的、有时神经过敏的气质。这种气质在来自南方的学生中尤为明显。他们的体魄、耐力一般都不强，打网球两局就够受的。可是他们的脑力劳动能力却十分了不起。只就许多课程必须用一门外语来学这一点，就足够使我深思了。有谁能想像一个美国高中毕业生，能使用法语学好大学课程呢？尽管中国学生在中学都读了6年英语，可是英语和汉语间的差异，比起法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，不是大得更多吗？

我的那位教授说得对：学生们确实很努力学习。他们花在学习上的精力，如果不是过多，至少也是很多的。于是，学生对教师的要求就严格起来了。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。开学两个月后，有个一年级新生抱怨地对我说：“有些讲师不配在这儿教书。”听他的口气，不像是自以为是、吹牛，而确实是很烦恼、失望。

西方文化朝中国丢过去，落下来，单是为了自卫，学生们也必须抓住它。这使他们的脑神经处于危险的高度紧张状态，但别无其他选择。3000年的古老文化传统和咄咄逼人的现代化世界，这两方面的知识都必须设法接受。同时在两方面出击，会使一些学生，特别是那些身体欠佳的学生产生情绪上的不稳定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找到像中国最负盛名的小说《红楼梦》中所刻画的那种男青年：一旦过于兴奋，就会痰中带血，喝一口酒也会面红耳赤。他们的生理器官过于纤细，一点点精神上的震动，就会产生身体上的失调。他们的健康状况是好的，但经过两年必修体育课的锻炼，经医生体检依然只得“弱”的，也不是

个别人。他们的身体不够强健，他们自己也知道。在别的地方，我从没见过有那么多鱼肝油瓶堆在饭厅里。

在他们面前，学业如此繁重，而救国大任又责无旁贷，他们只有下决心把每一点精力都贡献给那灾难深重的祖国。这种精神所产生的效果，有时是十分感人的。

体育锻炼对于他们，有时并非由于兴趣，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。“我必须强壮起来，必须要多锻炼”，这种话我听到过多次。当他们把自己和那些结实、强韧、恬静而又招人敬爱的农民和工人相比较的时候，常常流露出一些“忌妒”之情。“你看那些普通人，多么了不起！不是吗？”说话的是一个青年。他身材修长，两只眼睛又黑又深，喜欢深思冥想，有时若痴若狂。尽管他已经18岁了，可还是个孩子。

他们之间经常激烈地争论，有时争得面红耳赤，但在教室里却经常沉默。在饭厅比较放任。当食物未能及时供应时，盘、碗、汤匙就乒乒乓乓地敲起来，这类事情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发生。有些学生努力克制自己，另一些则不觉得对仆人也必须有所检点。

切莫误解，我描述这些敏感的年轻人，无意要说一切中国学生都有点神经反常，而是要说与西方大学相比，这里这种类型的学生要多得多。一般地说，这儿实际上没有粗壮男子汉的典型。中国种族温良、文雅类型的人多于活泼、健康类型的人。与这种生理状况相应的，则是某种迅速反映和易变的气质。这在那些南方人身上尤为明显。挑个准确的词儿，应该说他们是“艺术化”的。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绘画、诗歌方面具有智慧或天才，诗歌往往会从他们的心中自然地涌出。这些男孩子们的表现，一向被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典型反应，即文雅的气质，内省的趋向和对艺

术的根深蒂固的酷爱。

人们可能想到，具有以上特征的人，身处在到处都要斗争的现代世界里是不会舒服的。因为到处都会使他们悲观失望，未来也并不是玫瑰色的。中国是外敌入侵的牺牲品，也是经济危机的牺牲品。我想不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处境更坏，也想不出哪个国家的学生比中国学生的处境更坏。有统计数字说明，中国大学毕业生能有就业机会的不过2/7。我不知道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加前途渺茫。这里的男孩有自己的忧愁，但周围的暗淡景象并不足以抑制住他们的生机。悲观主义的哲学和他们无关。读者也许会说，那是由于他们还年轻啊。可是，身处我们这样的乱世，感到悲观失望、活着没味，是并不需要多大年纪的。原来，还有另一个民族特征在对中国学生起作用。我们记得，中国的哲学家从未倡导过悲观主义，而更为主要的是，中国人的气质基本上是属于乐天派的。

尽管他们性格内向，但神志清醒，没有深陷入人类意识的歧途。外界给他们以剧烈的震撼，他们依然有足够的轻松心情，使自己不沉溺于愁思和怨恨甚至无法自拔；尽管愁思和怨恨难免有之，但决不会持久。

一般美国学生要使自己浪漫起来，首先得恋爱，然后才能变得敏感。可是，中国学生的敏感性几乎是先天就有的。他们对美的欣赏是出自本能的。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宿舍里摆些花草，即便是一间颇不整洁的寝室。他们对满天的繁星，西山的落日，多姿的树木和斑斓的鸟雀等大自然所表现出的现象都能感受。这一切，对他们来说，并不是什么装点，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我朋友们的这种气质，使我得以和他们进行有关文学艺术的

敏感的谈论。他们是主修自然科学的，从未选修过什么“欣赏”之类的课程。但是这倒没关系，他们中间对西方艺术略有所知的人，常能提出一些有分量的见解。例如，他们能正确地认识西方音乐与戏剧的真正价值（舞台表演在中国从未被看做是艺术），他们对建筑艺术也能有所体会。

一方面敏感性可以让人有好提批评的倾向，另一方面，敏感性又会使人害羞。学生中确有少数漂亮小伙子身穿无可挑剔的英式工料的笔挺西装，像世界要人那样招摇过市。但这是个别的，大多数男孩一旦离开自己熟识的人群，就易受窘，感到焦躁和不自在。这一点在男女共处的人群中就更明显。

1919年，国立北京大学率先招收女生。以后，所有高等院校和许多中学实现了男女合校的办学方针。但男女之间的关系却并未因此像西方那样不加约束。在教室中，在学业上，以及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爱国活动中，既没有性别歧视，也不见有羞羞答答的。但在公众心目中，异性间的纯交际是不规矩的。连饭厅也是男女分开的。成群的男同学和成群的女同学分别在湖边散步。他们偶尔走到一起谈谈，或挤到照相机前照相。他们并非不愿意在一起，但需要找个理由，或者说找个站得住的借口。剧团活动、野餐和郊游都会提供机会，得不到这种机会的时候，男女就得分开。成双成对在一起的，在这座校园里并不常见，一旦出现，就会被看做是恋爱，或许说已经订婚了。

由于这座校园里没有美国高等院校常见的那些“健康的小动物”，因而也就不存在那些形形色色的“初恋”表演。男孩之间可以彼此很亲热，拍拍肩膀，挽臂散步；女孩之间表示亲昵、关怀就略显拘束。至于异性之间，就连一点亲昵的迹象也看不见。

图书馆里，如果一位男同学在一位女同学身旁偷张椅子坐下，已被看作是够大胆的了。偶然有一双异性在暗处亲个吻，就会成为传遍整个校园的话题。

和那些早在中学时代就已品尝过“生活”的美国学生相比，燕大的绝大部分男孩是天真的。但他们在另一方面，即我们称为生活的哲学方面，却比较成熟；在理解力上，在兴趣的广泛上，在艺术的资质上，也更为见长。大多数学生靠他们的敏感性，还能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具有清醒的认识。在这些方面，他们中间难得找出一个迟钝的人。可在性生活上，他们却是些情窦未开的童男子，对于女孩子，如果他们想过，那仅仅是出于好奇，或是一种远距离的倾慕，但他们绝不把女同学看做可供男性侵犯的猎物。“心心相印”的事可能存在，但也不过是在遮掩下的偷窥而已。男女青年在学生运动中合作时，双方的这种自我克制是至关重要的。他们可以因此而享有在别处得不到的自由，保证不致于陷入那些不可避免的纠葛。

以上叙述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是冷血动物。相反，他们的血是很热的。但中国的传统教养太强调男女授受不亲了。这正如礼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不论中国文化“破产”过多少次，它却依然存在。一个民族，对于生活价值所给以的界说，并不是可以轻易打破的，对于坚韧的中华民族来说，就更是如此了。

中国自古以来推崇读书，这种观念至今犹存。学者们享有至高的评价；学生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化的阶层，社会上也这样看。在中国社会阶层中，士是居首位的，然后才是农、工、商。中国文学的巨大宝库中，有涉及许多领域的内容，如哲学、宗

教、历史、政治和艺术，应有尽有，但唯独缺少对经济的论述，经济上几乎是一片空白。直到今天，中国学生对钱仍不屑一顾，或假装不屑一顾。

当有四个人一起看电影时，就会在电影院售票处窗口出现一场竞赛，即四个人都争先跑去买电影票。在饭馆里吃饭，也会有一场谁付帐的长长争论，因为每人都要付帐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侍者往往很为难，因为每人都同时向他手中塞钱。如果我同朋友一起进商店，他会理所当然地为我买的东西付款，除非我动作敏捷，抢先把帐付了。这里的生活费用很低。学生一日三餐，每月伙食费7至10元。但一进饭馆开销可就大了，人们坚持自己为大家付款，而要的菜肴又得超过实际所需的量，四个人吃一次饭馆，费用往往超过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。这就是“士”这个阶层的习惯。他们高居在钱这样的“琐事”之上（我是以严肃的态度说这话的）。这就是一个在世界上曾经最富有的国家的传统。有一回，当我要为多加的菜肴付钱时，我的同学对我说：“别管啦，钱没关系。”我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富裕。这就是一般常见的对钱的态度。实际上，这儿的钱还是很有关系的，甚至可以说关系重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。同样真实的是，愈是富家子弟，愈不会花钱。衣、食和家具的浪费都很普遍。这与当时大多数人口的贫困形成了病态的对比。男孩不大想到国民经济问题，但经常提到他们的家庭；他们从不说“我父亲供得起”，而说“我们家”。

关于中国沉沦、衰败的书籍已经出版了许多，在一代人中的新闻报导里，注意力集中的焦点，是那些表面上迅速发生的变化。过去一向平静的中国，这条小溪中的水早已被西方的风暴掀

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狂涛。许多人遭受了无比惨重的伤害。这种伤害不仅是经济上的，而且是心理上的。在海外，人们常会听到有关中国学生非民族化的说法，而一旦与他们接触，又难免发现他们常常把自己固有的素质丢掉，对本民族的历史背景缺乏了解和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的一切模式。

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不仅是强有力的，而且是极广泛的。实际上，这种介绍西方文化的方式并无特别可取之处，尽管如此，却依然引起了像胡适博士等人的倾慕（且不说那些马克思主义者），并使他们提出了“全盘接受”的主张。这种主张一定时期内曾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时兴。因此，我预料会在学生中看到盲目崇拜模仿西方的现象。

但情况并非如此。客观地说，中国学生对西方的现代化是持分析和鉴别态度的。西方的名人，如莎士比亚、歌德和伏尔泰，得到学生们的尊重；某些西方艺术，如戏剧等，他们也爱好。但没有迹象说明，西方文化在这里将按它的票面价值被接受；甚至对欧洲人和本与欧洲人同属的盎格鲁——撒克逊民族的美洲人都要严格加以区别。“要学习重要的思想家，那就得去欧洲。”一位有哲学头脑的三年级生对我说，“美国只以实用事物见长，对世界思潮无关重要。”没有人表示希望美国成为现代世界的领袖。这种感觉是由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造成的。另外，“民主”一词对于中国青年也不像过去那样动听了。

中国思想史显示，中国人的头脑天生对外来思想不易接受。它常常对新思想表示敌意。中国在远东拥有文化上首屈一指的地位，无疑增加了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给自足感，也增加了对外来事物的轻视，即把一切外来事物都看成是野蛮的。